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 诉求与矛盾

陈 然* 王义桅**

【内容提要】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互联、繁荣、健强和安全的印太，其中数字合作成为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的亮点，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抓手成为美国优先合作的对象。由于美国与印度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美印两国在数据本地化、数字发展自主权和网络安全及治理等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团结印度提升自身印太地区数字发展影响力的尝试也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美印数字合作的本质仍是相互利用，加之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美印数字合作的未来可能矛盾重重。鉴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印在合作目标和利益上的分歧，抓住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扩大中印数字合作的战略空间，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投资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等议题上与印度积极开展对话与合作，推动两国乃至整个地区数字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更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美印关系 数字合作 印太战略 数字战略

DOI: 10.16608/j.cnki.nyyj.2022.04.04

数字空间是人类新的活动空间，也是新型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数字化水平是未来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①2022年2月12日，美国拜登政府发布了执政以来的首份《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将数字发展和数字治理规则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① 马兴瑞：《加快数字化发展》，《智慧中国》，2021年第1期，第40页。

作为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作为美国“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新型数字大国，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在数字发展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一方面，美国在报告中承诺将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及其地区领导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将深化同印度在关键和新兴技术、互联网和网络空间领域推进共同方针。^①然而近年来美印数字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美印两国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激化了两国在数据监管、数据出境以及数字治理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矛盾。^②因此，美国尝试拉拢印度提升自身地区数字影响力并进而打造对华“数字包围圈”战略意图的前景并不乐观。

一、“印太战略”与美印数字合作

美国自奥巴马政府开始就积极对“印太”概念进行区域构建，提出了“印太战略”的政治构想。^③印太地区成为美国地缘政治实践的“中心地带”，对地区乃至世界格局的安全与稳定意义重大。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印太战略”的内涵和外延都出现了一定的拓展，数字技术和网络空间的战略价值成为“印太战略”的新焦点。在此背景下，美印数字合作被置于“印太战略”框架下，成为美印关系发展的重要一环。从发展方式来看，“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和循序渐进的动态演进过程，其特征是数字合作的范围逐渐扩大、合作模式更加立体。

（一）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印数字合作

特朗普政府时期，“印太战略”被描述为一种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联盟和伙伴体系构建的战略实践。^④这一时期，美国主要从国防和战略安全的角度推进美

^①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p. 8-1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② Atlantic Council US-India Digital Economy Task Force, “The Case for a US-India Digital Handshake,” Atlantic Council Report, June 2022, pp. 7-8.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2/06/US-India_Digital_Economy_Task_Force_The_Case_for_a_Digital_Handshake.pdf

^③ Ashley J. Tellis, “Waylaid by Contradictions: Evaluating Trump’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3, No. 4, October 2020, p. 140.

^④ 夏立平、钟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22页。

印数字合作，目标是推动印度数字发展，使其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务助推器，而其主要方式是不断在政策文件中强调印度在印太地区安全价值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协议和声明加强与印度的数字防务合作。^①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欢迎印度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大国和更强大的战略和防御伙伴，并将扩大与印度在美日印澳四边框架下的防务和安全合作。^② 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批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提出要“与印度在网络安全方面展开合作”并“振兴美国对友好国家政府的技术援助”。^③ 两份文件将“防御伙伴”和“数字合作”相结合，定位了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为后续美印数字合作提供了方向性建议。随后，两国进一步开展了诸多安全领域的数字合作。例如，2018年9月，美印首次防长与外长“2+2”对话会议结束后，两国签署了《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允许美国向印度转让安全通信和数据设备，并通过安全渠道与印度军方进行实时数据共享。^④ 美印还签署了双方期待已久的关于后勤共享和通信互操作性的国防协议，^⑤ 并于2020年10月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为印度提供一系列地形、航海和航空数据，并推进美印在卫星数据上实现共享。^⑥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通过“数字连接性及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及“南亚区域数字倡议”，积极帮助南亚地区提升数字连接水平，通过与私营部门、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接触，努力提升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地区整体

① 王文佳、汪伟民：《“战略利他主义”还是“选择性合作”——美国对印政策争论及其中国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2期，第108页。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 46-4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③ The White House,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February 2018, p. 5.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④ Jeff Smith, “COMCASA: Another Step Forwar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The Diplomat, September 11,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9/comcasa-another-step-forward-for-the-united-states-and-india>

⑤ 张许许：《印太战略视角下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印关系浅析》，《荆楚学刊》，2021年第2期，第8页。

⑥ Sanjeev Miglani and Nigam Prusty, “India Says to Sign Military Agreement with U. S. on Sharing of Satellite Data,”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ndia-usa-defence-idINKBN27B1QO>

网络安全防御能力，推动弥合地区数字鸿沟。

（二）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印数字合作

在特朗普政府的基础上，拜登政府全方位加大了对印数字合作的规模。特朗普政府时期提出的“自由而开放的印太”也逐渐被拜登政府更加丰富的“开放、互联、繁荣、健强和安全的印太”所取代，使“印太战略”呈现出更加立体化发展的特征。这一时期，美印数字合作更多关注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规则的协调与沟通。

拜登政府在2021年曾举行多次会议，围绕网络安全、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等议题与包括印度在内的美国同盟伙伴进行讨论。2021年9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就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和创建备用供应链能力进行讨论，提出要设立先进技术标准工作组。2021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发布了《美印联合领导人声明：全球利益伙伴关系》，提出美国和印度正致力于网络安全、5G基础设施及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①2021年11月，美印重启搁置四年之久的贸易政策论坛，并围绕数字贸易、数字技术、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政策交换了意见。此外，拜登政府还于2022年3月提议将印度的发展援助从2021财年的2500万美元增加到2023财年的6600万美元，以帮助印度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以及打击日益加剧的专制主义方面提升发展能力。^②

在新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拜登政府从基础设施、跨境数据流动和数字互联互通三个维度，完整提出了促进印太地区数字合作的方案。首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将促进安全和可信的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云计算和电信供应商的多样性，包括通过创新的网络架构如开放无线网络鼓励大规模的商业部署和测试合作，以加强美国与其盟友的网络基础设施韧性，改善集体网络安全并迅速应对网络事件。其次，《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聚焦数字经济，提出构建“印太经济框架——21世纪的多边伙伴关系”，根据开放原则管理美国和印太地区盟友的数字经济

^① “FACT SHE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 Global Leadership in Action.”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the-united-states-and-india-global-leadership-in-action/>

^② “Biden Proposes More Assistance to India in Clean Energy, Digital Economy.” *Business Standard*, Mar. 29, 2022.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international/biden-proposes-more-assistance-to-india-in-clean-energy-digital-economy-122032900056_1.html

和跨境数据流动，推动构建有弹性和安全的供应链，同时提高政策透明度和信息共享水平。最后，《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聚焦区域联通性，提出要建立“印度洋—太平洋和欧洲—大西洋”之间数字领域的互联互通，加强印太地区与欧盟等其他美国盟友的整体数字协作水平。^① 紧随新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拜登政府还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概念，并将印度纳入其中。“印太经济框架”以数字经济等领域为重点，希望通过制定标准和规则以保障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目前印度已同意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中的三个经济支柱（供应链、税收和反腐以及清洁能源），并正围绕“贸易支柱”进行谈判。^②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衍生品，反映出美国拓展数字合作的迫切心理。

综上所述，印太战略为美印数字合作提供了顶层设计，引导两国从国防及战略安全数字合作逐步转向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规则等全方位、多角度的数字合作，凸显了美国对推动美印数字合作的重视。然而，目前美印数字合作多是从规划和倡议的层面进行展望，实际成果寥寥无几。

二、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与诉求

虽然美国积极推进同印度的数字合作，但多年来美印数字合作并没有达成丰富的实质性成果，美印数字合作也没有得到印度社会的充分认可，许多印度学者和研究机构都曾对此表达顾虑和担忧。^③ 此外，美印数字合作还呈现出相互利用的特点，使得美印数字合作的前景扑朔迷离。

（一）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

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既体现在两国数字发展水平的非对称性，以及由

^①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 1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② Shreya Nandi, “India Opts out of Joining IPEF Trade Pillar, to Wait for Final Contours,” *Business Standard*, September 10, 2022.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economy-policy/india-opts-out-of-joining-ipef-trade-pillar-to-wait-for-final-contours-122091000344_1.html

^③ 例如，2021年印度人民党议员特贾斯维·苏里亚（Tejasvi Surya）曾批评美国企业在印度不受规制的发展将严重影响印度的民主政治，印度人民党IT小组负责人阿米特·马尔维亚（Amit Malviya）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See Anand Raghuraman, “The Storm Shaking US Tech in Digital India,” April 7,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e-storm-shaking-us-tech-in-digital-india/>

此导致的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治理标准和数字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

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源于两国数字发展水平的非对称性。^① 美国是数字发展领域的超级大国，其数字领先地位是全方位的：一是数字经济方面。据统计，美国的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居于世界首位，全球市值最高的 20 家数字经济企业中美国占据 16 家，前六家皆为美国公司（苹果、微软、谷歌、亚马孙、脸书、特斯拉），其市值总和达到 10.17 万亿美元，超过了东京证交所的总市值。^② 与此同时，美国数字经济产业链也最为完整，从智能终端到软件服务、从芯片设计到人工智能、从在线社交到综合电信业务，美国的数字发展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也呈现出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③ 二是数字人才方面。美国具有充沛的人才储备，得以在互联网和数字领域建立行业标准并占领国际市场的巨大份额。^④ 美国头部数字经济企业向世界数字人才提供着极具全球竞争力的薪资和工作待遇，吸引了全球众多数字人才聚集，其中就包括不少印度裔数字人才。推特前首席执行官（CEO）帕拉格·阿格拉瓦尔（Parag Agrawal）、微软 CEO 兼董事长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 CEO 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都出生于印度。三是数字治理规则方面。美国在数字发展的国内层面奉行“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强调减少政府对数字发展的干预，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数字发展呈现更加积极、自主的特点，有利于发挥企业和公民社会的创造力。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提供了相对完善的保护机制，各州也出台相对应的数据保护措施。总体而言，美国数字发展优势十分明显，是世界数字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印度自身工业基础较差，数字化进程起步较晚。尽管近年来印度提出了诸多数字发展战略，进行一些数字化革新的尝试，如莫迪政府提出了“数字印度”战略、“电子政务计划”和“印度制造 4.0”战略等，但实施效

^① Carsten Fink and Charles J. Kenny, “W (h)ither the Digital Divide?” *Info*, Vol. 5, No. 6, Dec. 2003, pp. 15-24.

^② 王滢波：《美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载王振、惠志斌主编：《数字经济蓝皮书：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 78~88 页。

^③ “马太效应”是指一种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现象。美国数字龙头企业多年来保持在高市值水平，且增长势头始终非常强劲。

^④ 朱兆一、陈欣：《美国“数字霸权”语境下的中美欧“数字博弈”分析》，《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第 55 页。

果不尽如人意。一是基础设施领域。印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现状仍然落后，在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力排名中，印度的基础设施竞争力居于第48名，治理竞争力也居于下游，尤其是电力和光纤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然较低。^①二是人才竞争领域。尽管印度为世界数字化发展输送了大量的数字工程师，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化领军人才，但印度自身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②根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的统计数据，印度每年有近500~550万技术人才的缺口。^③这种人才外流的境地使得印度数字化发展受阻，极为被动。三是数字鸿沟方面。印度城市和乡村的数字发展鸿沟仍然较大。印度2021年网民规模约8.29亿，互联网普及率约为60.46%，然而印度2021年互联网城镇渗透率为103.95%，而农村地区只有37.25%，近2亿人没有接入移动通讯，6亿人没有接入互联网。^④可以看出，印度数字化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与美国的数字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且很难在短期内缩小差距。

受美印数字发展水平的非对称性的影响，两国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美印两国处于不同的数字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必然导致两国在不同议题上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两国数字合作无法有效推进而仅停留在倡议和计划层面。

首先是在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本地化领域，美印两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态度存在一定偏差，在数据本地化问题上存在矛盾。美国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采取积极利用的态度，兼顾经济性与自由性，但并未放松监管。美国的积极态度与其本地企业利益密切相关，以谷歌、微软、苹果等跨国科技企业为代表的美国公司严重依赖数据的获取与处理，因此美国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数据的自由流动，以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美国2018年颁布《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又称《云法案》），规定符合条件的外

① 陈一末：《印度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载王振、惠志斌主编：《数字经济蓝皮书：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21）》，第129页。

② 王雨洁、吴婧姗、朱凌：《数据赋能工程教育转型：“数字印度战略及其人才培养实践”》，《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年第1期，第35页。

③ NASSCOM, “Analysis of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NASSCOM Report, 2014, p. 3. <https://www.nqr.gov.in/sites/default/files/Talent%20Supply%20and%20Demand%20Analysis.pdf>

④ 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 “Yearl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December 2021, pp. 1-2. https://www.trai.gov.in/sites/default/files/YIR_08072022_0.pdf

国政府签订数据流动协议后可以直接命令美国境内的组织传送数据，美国也可以根据协议相应条款直接获取该成员国或地区境内组织的数据信息。一方面，《云法案》使得全球大量信息数据能够顺利流入美国；另一方面，《云法案》也成为美国收集信息数据合法化的工具。与此同时，美国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监管，如设立外资安全审查委员会，要求国外网络安全运营商必须签订安全协议，并要求其通信设施建设必须在美国境内，甚至要求其将用户信息和交易数据等储存在美国境内。^① 对于数据本地化，美国则采用“双重标准”：对于外国在美企业，美国要求相关跨国公司进行数据本地化。例如，抖音海外版（TikTok）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平台，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出售，其背后是美国对 TikTok 所掌握的庞大用户数据的觊觎和防备，并进而对其进行本地化规制。除此之外，美国《国防联邦采购补充规定》也提出，对于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数据必须本地化。而对于美国在他国的企业，美国又努力阻止他国数据本地化进程。2018年，印度储备银行（RBI）颁布规定，要求在印度产生的支付数据必须实现本地化储存，不得离开印度国境，这一政策迅速引发美国的强烈抵制。在政府层面，美国公开敦促印度减少对数据本地化的限制，认为印度这一举措将有损美印数字贸易关系发展。市场层面，包括万事达、Visa 和美国运通在内的全球支付公司也一直在游说印度财政部和印度储备银行放宽本地化限制规则。

印度则在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问题上态度强硬，出台一系列严格的措施保护印度的“数字主权”，并试图借此推动印度本土数字企业的发展。^② 2019年，印度高级别专门委员会对2018年版的《个人数据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修订，《草案》要求每个数据受托人应确保在位于印度的服务器或数据中心存储至少一份本法适用的个人数据的服务副本。除此之外，被认定为“敏感个人数据”的数据仅能在位于印度的服务器或数据处理器中处理。《草案》的出台和修订迅速引发了美国的关切：一方面，美国政府威胁印度，试图通过严格的签证控制限制印度科技人才来美国工作，并决定终止印度普惠制（GSP）待遇。印度也不甘示弱，

① 华子岩、施佳启：《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原则》，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21年5月26日。

② Jeff Smith, “Modi 2.0: Navigating Differences and Consolidating Gains in India-US Relations,”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 3425, August 2019, p. 16. https://www.heritage.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8/BG3425_NEW.pdf

对 28 种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使得美印关系在 2019 年出现紧张，甚至有分析认为印美贸易战一触即发。^① 脸书、谷歌和亚马孙等美国公司也对该法案提出了质疑和关切。2022 年，印度有意撤回该《法案》，反映出多年来印度在推行数据本地化过程中面临的强大压力。综上可以看出，美印两国在跨境数据流动问题上态度各异，在“数据本地化”这一问题上分歧明显，这使得两国在数字合作上存在一定的矛盾。

其次是在数字发展自主权上，印度对美国企业插手印度内政以及拒绝履行印度政府要求十分不满。近年来，美国科技巨头屡次消极抵抗印度政府提出的要求，干涉印度政治活动。例如，2021 年 1 月，印度爆发农民抗议活动，相关新闻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快速传播。虽然莫迪政府要求推特公司删除这些“基于毫无根据的理由，在社会上滥用、煽动和制造紧张局势”的新闻，但是推特公司秉持“言论自由”等原则拒绝删除相关推文。^② 印度官员指出，推特公司的相关做法严重违反了印度信息技术法中有关“允许政府封锁‘威胁国家安全’或符合其他条件的在线内容”的规定。^③ 同年 5 月，印度人民党发言人萨姆比特·帕特拉（Sambit Patra）发表推文，声称掌握了“印度国大党对莫迪及人民党进行舆论攻击的证据”，推特随即将该推文标注为“受操纵媒体的内容”，利用自身影响力划定舆论导向，从而干涉印度政治。诸如此类的违反印度发展“自主权”的案件频发，使得印度十分排斥美国企业在印业务的开展。

印度 2020 年宣布将对外国的科技企业征收 2% 的“数字税”，而美国企业成为该政策的直接目标和主要受害者。对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随即对印度等国展开数字服务税调查，即所谓“301 调查”，并于 2021 年 1 月公布了调查结果。美国认为，印度等国数字税“歧视”美国企业、不符合国际税收普遍原则，并威胁“美国可以依照 301 调查结果追究

① “India Announces Retaliatory Trade Tariffs against the US,” BBC News, Jun. 15,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48650505>

② Soutik Biswas, “The Indian Government’s War with Twitter,” BBC News, February 12, 201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56007451>

③ “‘Gross Violation’: Ravi Shankar Prasad after Twitter Temporarily Denies Access to His Account,” *The Indian Express*, June 25, 2021.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ravi-shankar-prasad-twitter-account-it-rules-controversy-7375619/>

印度科学技术部的法律责任”。^① 随后，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也表示将会保留未来对印度等国家的数字税政策进行关税报复的措施。^② 虽然具体的报复性措施并没有开展，但美国政府的姿态十分明确，即若印度采取限制美国企业发展的措施，美国必将在政府层面进行反制。由此，“数字税”的出台反映出印度对美国企业乃至美国科技界的不满，而美国政府为保障本国企业发展又通过官方层面干预印度数字发展自主权。这种“市场—政府”的压力传导使得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逐渐升级。

最后是在网络安全及网络治理问题上，美印间存在的网络安全、网络监视和网络攻击事件破坏了两国间的合作互信，网络安全建设也成为合作的薄弱环节。早在2006年，印度就曾逮捕三名美国间谍，指控其利用美印网络安全会谈的机会收集印度情报。^③ 2014年，根据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印度驻美国大使馆及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了大规模监视，从印度收集了63亿条情报。^④ 由此，印度也成为美国第五大监视国，在网络安全这一问题上惨遭美国背叛。近年来，美印两国间的网络监视与网络攻击事件仍然存在。例如，奇安盘古实验室于2022年4月发布报告称，包括印度微生物技术研究所（IMTech）、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院和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BHU）在内的多家印度顶级研究机构均受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入侵。^⑤

①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India’s Digital Services Tax,” January 6, 2021. p. 2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Report%20on%20India%E2%80%99s%20Digital%20Services%20Tax.pdf>

②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USTR Announces, and Immediately Suspends, Tariffs in Section 301 Digital Services Taxes Investigations,” June 2, 2021.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june/ustr-announces-and-immediately-suspends-tariffs-section-301-digital-services-taxes-investigations>

③ Yang Wenwu and Luo Jia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ndia and America in Cybersecurity Cooperation,” in Jia-Wei Chang, Neil Yen and Jason C. Hung eds., *Frontier Computing: Proceedings of FC 2020* (Singapore: Springer, 2021), pp. 2063-2068.

④ Jason Burke, “NSA Spied on Indian Embassy and UN Mission, Edward Snowden Files Reveal,”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5,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sep/25/nsa-surveillance-indian-embassy-un-mission>

⑤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北京奇安盘古实验室发布美国国安局黑客组织进行网络攻击报告的答问》，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2月24日。 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jzg_673183/jks_674633/jksxwlb_674635/202203/t20220315_10651920.shtml

网络安全合作也是美印两国数字合作中的薄弱内容。一方面,受制于两国复杂的网络安全应对机制,美印两国开展网络安全合作的程序繁杂,协调成本较高。另一方面,美印两国在推进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上关注重点不同,分歧明显。美国网络发展较为成熟,更多希望与印方在情报分享方面合作,共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以保护美国在印度公司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等。印度则希望关注基础性议题,如推动美国加大对印度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提升网络安全应对能力培训等。^①因此,两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仍然任重道远。

此外美印两国在网络安全治理的主体问题上具有不同观点。美国奉行“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模式,认为公司、公民社会等社会性力量是互联网治理的主体,并希望减少政府的干预。而印度奉行“数字主权”的理念,强调政府在数字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2014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会议中,印度提出由国际电信联盟(ITU)接管并履行互联网治理的主要职能,将互联网治理重新纳入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多边主义框架,这一方案随即引发美国强烈不满。^②

综上所述,不同数字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限制以及两国在数字化发展理念上的差异导致美印两国在诸多数字发展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这种矛盾进一步阻碍着两国数字合作计划的落地。在可见的未来,在印度的数字化进程仍然无法实现跨越性发展的情况下,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仍将持续。

(二) 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

美印两国开展数字合作的初衷和本质是两国间的“相互利用”。美国希望利用印度的地缘政治价值和数字发展的迫切需求,巩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数字发展的领导地位,并意图利用印度作为关键节点构建“对华数字包围圈”。印度则希望利用美国先进的数字发展技术和数字投资,以实现自身的数字化发展。这种“相互利用”的特征存在先天性的矛盾和不足,决定着美印数字合作或将无法实现。

美国对印度的“利用”体现在其不断鼓吹印度的重要地缘价值,要求

^① 张春燕:《美印网络安全合作的新进展与发展趋势》,《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1期,第106页。

^② 张舒君:《印度网络安全治理视域下的美印网络安全竞合》,《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年第8期,第70页。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

印度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野心承担成本和代价。美国将“亚太”的概念拓展至“印太”，将其政治野心延伸至南亚腹地，其本质就是希望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印度的战略地位，对中国、巴基斯坦甚至中亚地区施加进一步影响。以丁肖·米斯特里（Dinshaw Mistry）、罗伯特·博格思（Robert Boggs）和阿赞·塔拉普尔（Arzan Tarapore）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认为，美国对印战略是一种“选择性合作”的战略，认为美国应与印度在利益和理念相同或相近的领域加强合作，以维系此前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彼此立场与政策相悖和冲突的领域应进行“缠斗”。^① 在数字发展领域，印度与美国数字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重要议题上有许多分歧，本不应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但美国却在多份战略、框架和经济合作政策文件中强调印度的战略价值，认为美国同印度在数字发展方面具有相近的利益。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指出，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来源于两国共同面临的来自中国的数字崛起威胁，共同对数字经济、网络安全和数据治理的发展需求，因而应当进行数字合作。^② 然而，美国是否考虑到印度数字化发展的现实情况？是否将促进印度数字发展真正作为美印数字合作的目标？面对这些问题，美国的态度仍然模棱两可。可见，美国对印数字合作更多是从美国自身角度出发，将美印数字发展置于“印太战略”的大框架下，并未因地制宜地考虑印度数字化发展现状和需求。

表面上美印关系持续向好但仍然无法改变“美国只是想利用印度，将其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小伙伴”的本质。^③ 印度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工具和抓手，美国对印数字合作是满足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其实质是美国利用印度实现其自身战略目标。受制于美印两国的数字矛盾，美国利用印度提升其自身在印太地区影响力并构建“对华数字包围圈”的企图将无法得到有效实现，两国数字合作难以深入发展。

在印度对美合作诉求方面，从战略诉求上看，印度开展对美数字合作，既是出于对美国数字投资和先进数字技术的垂涎，又是出于对美国数字实力的仰仗。同时，印度也希望通过与美国的数字合作提高印度的数字吸引

^① 王文佳、汪伟民：《“战略性利他”还是“选择性合作”？——美国对印政策争论及其中国因素》，第119页。

^② Atlantic Council US-India Digital Economy Task Force, “The Case for a US-India Digital Handshake,” pp. 7-8.

^③ 孙晋忠：《美国对印度的政策与美印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第30页。

力，从而推动世界各国关注印度的数字发展及战略价值，提升印度在全球数字发展中的话语权与国际地位。

近年来，印度不断向美国靠拢，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印太战略等美国主导的战略布局。印度看似融入其中，但其实质是印度根据自身的战略需求开展对美合作。一方面，印度期望从美国数字投资和先进数字技术中获益。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拥有强劲的经济实力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印度的国家利益将通过全方位提升与美国的关系而得到满足。^①事实上，尽管美国并未以促进印度数字发展作为两国数字合作的主要目标，也未要求美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印数字发展合作，但印度凭借其人口红利和对理工类（STEM）学科发展的重视，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据统计，像埃森哲（Accenture）、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和德勤（Deloitte）等美国IT服务公司的大部分实际工作都在印度完成，仅这四家公司就在印度雇用了约40万人，此外超过1000家美国公司已在印度建立了自己的业务，雇用了约100万人，主要业务为战略创新和数字研发。^②可以说，印度充分利用美国“印太战略”对印度的鼓吹，提升自身在美国企业界的存在感，获得了资金和产业发展机会。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更像是印度的“投资方”而非印度的“合作方”。由此，印度乐于参与印太战略，更多的是出于国家长远经济利益与发展的考量，换言之，其国家利益将通过全方位提升与美国的关系而得到满足。^③

另一方面，印度希望提升自身的数字吸引力，从而使世界各国都关注印度的数字发展及战略价值。美印数字合作仅是印度数字发展中的一环，印度真正的意图在于形成联动效应，使世界各国都主动与印度开展数字合作。欧盟的“印太战略”就提出，将优先考虑与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志同道合的伙伴签订数字伙伴关系协议，以符合欧盟促进民主及人权的价值观

^① S. S. Mehta, *Launching India into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Minerva Press, 1999), p. 115.

^② David Moschella, "Is India the Next Great U. S. Dependency?" May 18, 2021.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21-05-18/us-needs-to-balance-dependency-on-india-for-it-services>

^③ 马嫫：《冷战后美国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国际观察》，2003年第2期，第43页。

以及欧盟的数字议程。^① 在“2025 路线图”的规划下，印度与欧盟积极开展数字、能源和运输的可持续数字转型合作。例如，欧盟主动向印度提供其超级计算平台（Exscalate4CoV）用以共抗疫情，并通过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为印度提供极端天气建模，使印度有效提升应对风险的治理能力和专业知识。^② 印度与澳大利亚还成立了网络安全合作联合工作组（JWG），有效加强了两国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 5G 技术和物联网设备安全方面的合作。^③ 此外，印度还与日本签署《印日数字伙伴关系合作备忘录》，计划在班加罗尔建立印度—日本小微企业中心，并在软件、半导体和电子设备的系统设计方面进行合作。^④ 日本还拟与印度合作构建国家数字平台，以提高新兴市场数字发展的灵活性。^⑤

综上所述，印度开展对美数字合作的实质是出于对美国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垂涎以及利用美国形成数字合作联动效应的需要。而且，美印数字合作还将提升印度在数字发展领域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从而推动印度搭建更多的数字合作伙伴关系。

三、美印数字合作矛盾对中国的影响

受制于美印数字合作矛盾，美国试图通过“印太战略”改变中国数字发展的周边环境、建立对华“印太数字包围圈”、迫使中国在数字发展上做

^① Gregory Tiberghien-Römer, Aadil Sud and Walter Brenno-Colnaghi, “Enter EU: The Challenges and Cooperation Potential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EIAS), October 19, 2021. <https://eias.org/policy-briefs/enter-eu-the-challenges-and-cooperation-potential-of-the-indo-pacific-strategy/>

^② “EU and India to Work together for a Stronger Digital Cooperation and to Tackle the Pandemic,” May 11, 2021.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news/eu-and-india-work-together-stronger-digital-cooperation-and-tackle-pandemic>

^③ “India, Australia to Expand Cooperation in Digital Economy, Cyber Security,” NDTV, June 10, 2021.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india-australia-to-expand-cooperation-in-digital-economy-cyber-security-2461118>

^④ “Promotion of Japan-India Business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elcomed,”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Japan, December 12, 2019.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19/1212_003.html

^⑤ 《日本拟与印度合作构建国家数字平台》，《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2020年8月28日。 <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424779.html>

出让步的企图将无法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对此放松警惕。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遏制中国的野心将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印度数字崛起势不可挡，极有可能成为新兴数字超级大国，必然挑战中国的数字大国地位。因此，中国虽然不必过分担心美印数字合作会对中国数字发展带来较大负面效应，但仍然要关注美印数字合作的影响，并利用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探索中国数字化发展与国际合作新的增长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同印度数字合作的突破口。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印关系陷入低谷，两国数字产业发展的竞争压力较大，因此对印开展数字合作面临较大的压力。

（一）印度对与中国进行数字合作的顾虑和戒备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22年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印度居世界第44位，而中国位于世界第17位。^①中印之间巨大的数字差距使得印度对中国抱有不信任感，对中国的发展怀有疑虑。

2017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提出构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新型项目，“数字丝绸之路”旨在依托中国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以光纤网络基础设施、卫星导航及跨境电商等优势产业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智能支付和物流体系建设，从而推进建设“一带一路”数字合作机制，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目前，中国已与捷克、古巴等16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与阿联酋等7个国家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②但是，印度对“数字丝绸之路”并不积极，印度智库普遍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是中国获取地缘战略优势、打压印度数字化独立发展能力的阴谋。甚至部分印度媒体认为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能够获取沿线国家关键数据，制造“数字陷阱”以威胁他国国家安全。^③“数字丝绸之路”计划也与印度的“季风计划”、“萨加马拉项目”（Sagarmala Project）和“东向行动政策”产生一定的地缘战略利益重叠，更增加了印度对中国数字区域合作的排斥。除此之

① IMD, “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2,” October 2022, pp. 28-29. https://www.imd.org/.../wcc/docs/00-media-site/2022/competitiveness/WCY_Ranking2022.pdf

② 顾阳：《“数字丝路”建设将成全球发展新引擎》，载《经济日报》，2019年9月9日，第3版。

③ 申仲秀：《印度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评析》，《情报杂志》，2021年第6期，第115页。

外，印度对中国在印数字发展实施了诸多限制性措施，甚至直接进行打压和制裁。2020年以来，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以所谓的“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多次封禁有中国背景的应用程序（APP）。因此，印度对中国在印数字发展以及中国的区域性数字合作倡议都带有一定的戒备心理，甚至抵制中国同印度的数字合作。

印度对“数字丝绸之路”的态度较为消极并不意味着印度全盘拒绝与中国的数字合作。一方面，中印两国在多边机制中仍然保持着积极的数字合作探讨，中国通过与印度共同参加多边机制中的数字合作，展现着中国数字和平发展的态度与属性。以金砖国家机制为例，印度具有主导金砖国家体系内数字领域合作的强烈意愿。^① 2016年4月，印度创新性地举办“数字金砖闭门会议”，并在会上讨论《德里政策建言》（Delhi Proposition to Policymakers），认为金砖国家应围绕互联网治理、电子商务、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网络安全和用户权益保障等问题进行积极合作。^② 该会议也成为“数字金砖”概念的起源，受到了各国的一致欢迎。多年来，金砖国家在信息通信技术环境、网络安全与犯罪、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工作组六大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合作，合作内涵不断丰富。2022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达成《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将数字认证、电子支付、电子交易单据、数据隐私和安全等数字经济前沿问题纳入其中，并关注弥合数字鸿沟，缩小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服务和数字技能方面的差距。^③ 今后，中国还将在金砖国家机制框架下，推进同印度的数字合作。

另一方面，人类已进入数字文明时代，数字化发展推动全球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形式的“脱钩断链”和构筑“小院高墙”的行为，在数字化时代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行为。尽管印度对中国提出的数字合作倡议存在顾虑，但是由于数字化发展融合创新的属性，使得印度的数字化发展离不开中国在产业链、技术和投资等方面的支持，中国也需要在同印度的合作中不断得到新的数字化发展动力。因此，中印数字合作仍然是符合数字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大趋势。

① 蔡翠红：《“数字金砖”的机遇与挑战》，《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第151页。

② 蔡翠红：《“数字金砖”的机遇与挑战》，第148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2022年6月，第1~4页。

http://images.mofcom.gov.cn/gjs/202206/20220610182416496.pdf

（二）中国开展同印度数字合作的可行路径

中印在数字战略追求方面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从战略内容还是从战略合作动力而言，双方仍然存在数字合作的可能性。正如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阿米塔布·坎特（Amitabh Kant）在第三届中印互联网对话大会上所说的：“印中互联网科技合作前景广阔，印度市场非常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① 格拉泽（Charles L. Glaser）的权变现实主义提出，在某些条件下合作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当“安全追求者”在物质变量中倾向防御，在信息变量中传递出“有代价的信号”，证明自身为可信任的安全追求者后，合作能够在两国之间达成。^② 因此，如何在两国战略合作中获取对方信任，在不触动对方抵触情绪的同时顺利实现战略合作，是分析中印数字战略合作可能的关键问题。

首先，实现数字战略合作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先行的作用。一方面，企业以利益为导向，对市场和资本的敏锐度更高，而印度的数字发展需要先进的技术、充足的资金以及可持续的人才作为发展保障。另一方面，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能够在中印关系中起到“缓冲器”的作用，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在印行业商会的作用，推动企业充分了解印度发展需求和情绪偏好，及时解释中国相关政策，缓和印度对中国官方层面数字合作倡议的戒备。因此，企业是中印数字合作的共同推动者，也正是由于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活力，中印数字战略合作才有更大的可能。

其次，在数字战略合作中中印两国应寻找共识、发掘共同利益，充分发挥两国数字发展中的优势互补性，在重点领域开展数字合作。简而言之，既要寻找两国合作的互补点，又要在两国共同的优势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发展中的话语权。中国和印度都有丰富的人口红利，数字人才的培养是两国教育的重点，也是数字合作最佳的切入点。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印度来华留学生达到23198人，按国别排序位居第四。^③ 然而，印度来华留学生的主要专业为临床医学，且以本

^① 《第三届中印互联网对话大会在新德里举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站，2018年9月29日。http://www.cac.gov.cn/2018-09/29/c_1123500479.htm

^②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 51.

^③ 《2018来华留学统计》，中国教育部网站，2019年4月12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科为主，高层次人才来华意愿不强。^① 而中国赴印度留学人数则常年维持在1000人以下，与印度在华留学人数完全不成正比，且多为国家公派留学学习印地语的语言人才。尽管位于“南亚硅谷”班加罗尔的韦洛尔科技大学也成为许多中国自费赴印留学生的选择，但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专业规模评估，中印数字教育人才交流的水平仍然较低。^② 因此，中国应该加强同印度在人才发展方面的合作，通过举办更多的数字交流活动，提供更多的留学机会，以帮助中印两国年轻人共同在数字化发展学科方面取得进步。

此外，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领域也是两国可以探索的重点合作领域。近年来，中国和印度都制定了诸多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领域的法律，两国都力图探索出不同于美国和欧盟的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道路。一方面，印度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案》和《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与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有诸多可以探讨的课题，两国在“数据主权”、“数据本地化”和“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具有相似的态度，可以进一步深化交流。另一方面，印度与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方面可以加强合作，共同以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发挥主导作用。例如，两国可以在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等多边治理机制框架下举办针对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相关问题的研讨会，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

再次，中国可以不断强化数字合作的“防御性”特征，向印度传递“善意的信号”。格拉泽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单方面的克制来传达良性的动机，^③ 中国开展对印数字合作应对印度顾虑做出积极回应，在政策和合作倡议宣贯时突出强调中国在“数据收集”和“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自我约束性，防止印度对中国产生“数字渗透”和“数字陷阱”等错误认知。中国在南亚进行数字合作和投资时，可以将印度因素考虑在内，主动邀请印度企业共同参与在南亚地区的数字建设，或通过公开的招投标工程，保证“数字丝绸之路”等地区性数字合作倡议在落地时照顾到印度的关切，并保证对外投资方面的透明性和包容性。此外，中国企业要全面且专业地熟悉

① 周艳梅、周发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印度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路径选择》，《南亚研究季刊》，2021年第1期，第145页。

② 吴霓、杨薇：《“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印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76~78页。

③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p. 69.

印度经贸和知识产权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应对预案,防止产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提升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形象。^①

最后,中印应继续保持政府和民间层面的交往,继续延续“中印互联网对话大会”等对话方式,塑造两国发展中国家和数字大国的共同身份,为中印数字战略合作营造良好的氛围。正如印度媒体指出,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促使中印两国加强数字合作,新技术也将极大促进中印两国的商业信任构建。^②因此,中国应通过商贸互通、官方会谈、合作邀请等方式传递积极的合作信号,展现出中国的善意,表明中印数字合作并非对印度数字发展自主权的干涉,也并不会打压印度的数字化发展,而是希望同印度携手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 语

美国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在延续美国对印太地区战略价值关注的同时,将目光聚焦数字发展,试图通过拉拢印度塑造美印数字同盟,通过改变中国周边的数字发展环境遏制中国的发展。印太战略充分暴露出美国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抢占他国数字发展战略空间的企图,也揭示出美国奉行数字霸权主义的本质。

美印数字合作面临诸多矛盾。一方面,受制于两国数字鸿沟,美印在数据本地化、跨境数据流动、数字发展自主权、网络安全及治理等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限制了两国合作成效。另一方面,美印数字合作的本质是两国相互利用,美国只是希望利用印度的地缘战略价值而并没有从印度数字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展数字合作,印度则是“将计就计”利用美国对印度的重视获取一定的数字发展机会并拓展印度的数字吸引力。因此,美印数字合作只能停留在表层而无法深入,美国所希望达成的地缘目的也将无法实现。

大国间的数字合作与竞争将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的新因素,也将直接影

^① 亢升、杨晓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印数字经济合作审思》,《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3页。

^② Atul Aneja, “China Taps India as Digital Economy Partner,” *The Hindu*, November 7, 2018. <https://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china-taps-india-as-digital-economy-partner/article25436938.ece>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

响国际政治的权力分配，进而影响数字时代下的国际格局。面对美印数字合作，中国在保持警惕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同印度的数字合作路径。一方面，要认清印度对中国数字发展的顾虑所在，定位中印目前存在的矛盾点，这有利于帮助我们提前识别并规避安全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多边机制传递中国善意信号，与印度强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身份，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加强对话，这有利于提升中国和印度数字合作的效果，可推动两国乃至整个地区数字发展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从而能更好地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辑 吴兆礼）

geopolitical balance of power. The secu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the U. S. is based on their collective geo-politic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ey advance cooperation through bilateral security and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arms trading interaction targeted at the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uch cooperation. The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bring India into collective security structures under its leadership, and ultimately establish an India-U. S. security alliance. While so, structural divisions between India and the U. S. represent a major obstacle to more substantial bilateral security relations, and the shared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states are not sufficient to resolve or put aside these issues. For India, the formation of a security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only undermine it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traditions and norms, but it will also bring extraordinary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pressures, ultimately increasing its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In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of multilateralism and pluralism pursued by India, more strategically autonomic India can maximize its interests.

KEY WORDS: India; India-U. S. Relations; Defense Cooperation; Security Cooperation; Quad

U. S. -India Digit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Concerns and Tensions

By Chen Ran & Wang Yiwei

ABSTRACT: The U. S. Indo-Pacific Strategy envisions an open, interconnected, prosperous, strong and secure Indo-Pacific, with the newest element of the strategy report being a focus on digital cooperation. As a fulcrum of and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ndia is a priority count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vis-à-vis this area of cooperation. While so, gaps in digital technologies between the U. S. and India are significant, including with respect to data localization, autonomous digital development, cyber security and digital governance. While the U. S. has attempted to work with India to enhance autonomous digital development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ndia has not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is move. Fundamentally, U. S. -India digital cooperation is limited to the transactional level,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ncertainties presenting tensions vis-à-vis the future of their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is space. As such,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ces in objectives and interests between the U. S. and India, China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tensions prevailing in U. S. -India digital cooperation, and should expand space for Sino-India digital cooperation. China can achieve this by cooperating and engaging in dialogue with India on skills development,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operation suitabl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will enable the two countries, and even the whole region to make progress towards more open and flexi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operation, and towards realiz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cyberspace.
KEY WORDS: U. S. -India Relations; Digital Cooperation; Indo-Pacific Strategy; Digital Strategy

The Rise of the Afghan Taliba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outh Asian Order

By Yu Kaiming & Yan Wei

ABSTRACT: Relations between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ndia have long been conceptualized as “triangular games”. The Taliban’s return to power has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new dynamics vis-à-vis the “triangular games”, especially as the impact has spilled over into Afghanistan’s neighboring countries, causing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As external powers such as the U. S. has withdrawn from South Asia, the Taliba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and assertive vis-à-vis regional geo-politics. Meanwhile, Pakistan faces an improved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These are both signs of a much more dynamic geo-political balance of power emerging in South Asia. While so, the rise of the Taliban has aggrava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ethnic separatism in South Asia, while also caus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especially refugees and drugs-to spill over into other parts of South Asia, prompting growing reg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dynamics has resulted i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emerging as a key focus of traditional interstate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At present, the South Asia region is becoming more autonomous as external interventions weaken.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will need to transcend zero-sum thinking and cooperate towards resolving security challenges.

KEY WORDS: Afghan Taliban; South Asia; Extremism; Geo-Politics; Regional Security

The Strategic Ambitions and Rationale behind America’s Millennium Challenge Plan in Nepal

By Wang Jing

ABSTRACT: As the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eace Corps, and other traditional aid mechanisms continued to encounter ineffectiveness and complete failure, in 2002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Plan was introduced to breathe new life and vigor into America’s overseas assistance. While so,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recipient countries of this